

• 供批判用 •

张铁生在太原市湖滨会堂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张铁生在太原市湖滨会堂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

省委领导和各位同志们：

咱们来大寨参观学习，至于参观一路上的体会收获就不准备讲得更多了。对咱们山西省的同志们这样的热情招待和欢迎，感谢的心情也不准备多讲了。要不这么大的一个会我要讲这些东西恐怕太自私了吧！生来还是第一次在这样多人面前讲话，所以，压力再大我还是有信心把话讲得好一些，如果我要是讲得不成功的话，那这么几千人我恐怕就犯罪了，罪该万死。真是的还是生来第一次的。昨天在昔阳讲了一次，大家都不太理想，人哪差点没有讲散了。今天依靠大家捧场哪。

同志们，光辉的一九七五年过去了，一九七六年的春天又开始了。在新的一年里，刚刚开始的日子里边，大家时刻不该忘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想努力想拚命的向大家来说明白的一个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来讲，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主要危险，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边呢？修正主义必然是我们的主要危险。咱们教育战线就当然如此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个结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不是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党的基本路线阐明了这一点，党的十大又重申了这一点。要认识修正主义在我们教育战线也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去研究一下历史，因为，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苏联在一九一九年，也搞了一次教学改革，当时苏联主管教育工作的是列宁的夫人，卡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同志，她遵照列宁的教育思想批判改造了沙俄帝国主义传流下来的旧的教育制度，为苏联开始制定新的教学大纲，破除了很多的资产阶级的陈规戒律，提出了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等问题。正是教育界的改革刚刚开始，就被苏联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疯狂地镇压下去了。在我们国家里边呢？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边，教育革命第一次的在我国蓬勃地开展起来，当时，象我二十几岁的人刚刚记事。曾经记得当时真是一破旧学校几千年，学校开始和社会息息相通了。工人、农民选送上大学，厂办学校，校办工厂，函授教育，多种形式办学，等等吧。大量的新生事物涌现出来了，真是大快人心，但是很快地就被刘少奇等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镇压下去了。一九六一年他们又炮制了一个高教六十条，开始在我国全面地推行一整套的修正主义路线。就这样，解放以后，资产阶级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整整的统治了十七年，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再呢，仅仅是在一九七二年出现了一股右倾回潮。资产阶级刮起了一股批极“左”的妖风，其实就是要反攻

倒算，要革造反派的命，把林彪形“左”实右的帽子扣在我们身上来。资产阶级也象一九五八年一样地骂我们，质量低、乱糟天，最遗憾的是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在反动的势力压力之下，低头认错。

《决裂》电影大家可能都看到了，通过那个电影，研究和分析使我们对我国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有了更初步的了解。总结整个十七年的历史教训，所以，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新问题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在四届人大会上主席又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且要使全国都知道。一个是要广大群众都知道，今天又告诉我们要使全国都知道。主席的再三强调的指示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为什么说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呢？我们看是有着它非常深的思想根源，有很深很深的阶级根源，有特别广大的社会基础。单就这个问题愿意和大家讨论一下。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教育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也是个历史结论。十七年，我们又对教育战线有两个基本估计，可是这两个基本估计，至今仍然有些人不服气，不理解，甚至有的人抱有抵触情绪。我们说，这个结论完全正确。首先从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思想路线上来看，封、资、修的教育思想体系根深蒂固。从教育路线上看呢？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学而优则仕为精神支柱。从组织路线上看呢？真是封资修盘根

错节。我们说盘根错节，有人不愿意听。不愿意听就等于客观不存在了吗？首先让我们从十七年我国的教育大权来看，十七年我国的教育战线，教育领域上由刘少奇、陆定一、周扬等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的一统天下。下有四大金刚，八大怪，再下边条条专政、块块统治，也就是说十七年在我国的文化教育里边到处布满了一个又一个的资产阶级的土围子。有些人对十七年的基本估计就是不服气。我们可以搞个调查吧！如果我们把十七年全国所有的大专院校都检查一遍，请问有几个大专院校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又有几个大专院校他们执行的不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们再把十七年大专院校的一把手都把他们请到咱们这个会场里边来，逐个的给他们作鉴定，究竟有几个执行了正确路线，恐怕在他们的队伍当中，在这些老干部队伍当中最起码也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犯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错误，执行了错误，甚至于在他们中间，还出现了人数不少的走资派、黑帮、资产阶级分子、投降派。十七年的教育大权，就是这么个基本情况。这就是结论。不管你服气不服气。不管你认账不认账，这是客观存在，这是历史。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见证。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特别特别广，而且至今顽固的存在，至今还有不少的人，包括我们党内的有些领导同志，还远远没有和他划清界限。在我们辽宁，有一位抓教育工作的老干部，老资格。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位老资格忠实地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化革命以后，十年来，一直大撒手

不管，消极怠工，你要说他不管吗？十年来他也管了两次教育，这两次教育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管得呢？第一次就是在一九七二年，人家搞右倾回潮的时候，这位老资格，老干部跳起来了，要反攻倒算，大喊乱糟天。抓第二次教育，就是一九七五年后半年，右倾翻案风，他又一马当先。在我们沈阳农学院，也有这么一个老院长，老资格，十七年他不辞劳苦，起早贪晚地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立下了汗马功劳，真要头发都干白了，蹶着屁股干，可是现在呢，教育要革命啦，他老人家就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躺倒不干啦，搞消极怠工，可见这些人对教育革命格格不入达到什么程度，对旧的教育制度又是多么留恋。

我们学校这位老院长，在一九六五年间他曾经组织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中国农业教育大全”，就是中国的农业教育学，其实就是苏联反动的教育学家凯洛夫，他的教育学在我国教学战线的翻版充满着修正主义的黑货，由此可见，这个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体系，在我们这位老院长脑子里边不光光成形了，而且都写成经典著作了。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体系就是根深蒂固。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办的学校如果完全去依赖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极大的矛盾，完全不可能。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粗手大脚的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人农民上大学，都是破天荒的新鲜事。有点无产阶级感情的人都有说不出来的

痛快，真是大快人心。咱们山西昔阳的一条经验根本在路线、关键在班子，这是一条真理。对于我们学校那位资格很老的老院长的问题，第一需要我们帮助他改正和认识错误，第二需要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当中去教育他。可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他抓了几十年教育了，已经成型的教育思想和他那非常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要想在几年之内，甚至几个月之内，就让他彻底的转变相当不容易的。八、九年时间啦，工作我们没有少做啦，我们等啊！等啊！等了一年又一年，转变了没有，一点也没有转变。从理论上也没有服气，从态度上更是顽固，一直对教育革命抱有很大很大的抵触情绪，而且满腹牢骚，搞消极怠工，这样的人我们帮他搞路线分析，做他思想工作，提高他认识。可是呀！人家比你更高明，一点也听不进去，不改，死也不改，硬可把花岗岩脑袋带到棺材里去，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的对他进行等待，迁就，恭敬，而且，照旧把他摆在一、二把手的位置上，叫他继续统治学校，如果那样的话，我看我们共产党有点太消极啦！恐怕是右倾。十七年我们失败的教训，这个亏就吃在这里面，我们不能够这样，决不能这样。今天，我们办教育，也是在搞阶级斗争，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婆婆妈妈的哄着来，不能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原则。咱们学校就根据辽宁省委的指示精神，要对农学院的领导班子动一个大手术，听了之后，特别特别高兴，这个大手术我们动啦！现在还正在动。我们彻底的改组了过去的领导班子。在

我们的领导班子里边结合了三名工人师傅，从农村选拔了三名贫下中农的优秀代表，选留了班子当中坚持正确路线的中年干部，提拔了一批啊提拔了一位年轻的教学干部，而且党委里边第一次的工农兵学员代表也进了党委，在班子里边还保留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党内的老教授，一共由十一名组成。阶级成分大大的改变了。这个班子，这个新的班子，要在资产阶级看来，一个普通的工人当大学的党委副书记，一个小小的农村公社书记破格提拔，大胆使用，当大学院长，这些事情啊，恐怕都是不可理解的。我们这个班子刚刚成立，就有的人就放风啦：说怎么能行，大学的领导班子没有几个懂教育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你们只知道做工、只会种地。大学呀！搞大学嘛，还得那些教育家，还得象咱们过去那位老院长。而且，还有的人，要把那位老院长请回来。我们说请这位老院长，你们就别想啦。被你崇拜的、五体投地的念念不忘的那位老院长，我们派他回家抱孩子去啦，连顾问也不让他当，给他小楼、给他地位、给他高额的工资，给他待遇，什么都给他，就是不让他当一、二把手。就是不让他继续统治学校，把他养起来。至于外行内行的问题，我们看，我们那位老院长搞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他最内行，出名的内行，顶尖的内行，搞教育革命极大的不适应，绊脚，甚至达到对教育革命的反动的程度，别的不谈，咱们就单从办农业大学嘛，单就业务专长来讲内外行我们看，我们那位权威的农学院的院长，全国都有名的院长，如果把他带到农村

去，什么内行！我看呀，连五谷杂粮他都认不全，还写书，还写著作，还有的人吹嘘他，还内行呢！我看他内行个屁！有些人老是在下边捧场，说什么老院长有功。什么功劳！十七年执行错误路线，确实付出很大的劳动，很多的辛苦，这一点咱们承认。没有功劳有苦劳嘛！严格地讲连苦劳都没有，有点徒劳，白劳，帮了倒忙嘛。帮了共产党的倒忙，什么功劳，动不动就摆老资格。我们看，我们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优秀代表，我们的革命干部，我们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观点，有立场，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知道在农村三大革命第一线的需要，他们知道贫下中农对于我们这个学校如何办。有哪些要求，有哪些预望。他们最知道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农业大学，应该怎么办，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他们最理解我国的教育为什么要来一场革命，他们也最知道，最清醒，他们进驻大学以来是执行特殊使命来的，是占领上层建筑的，总的来讲，他们搞教育革命，办社会主义大学，他们是最内行的。我们这个被人家称为最外行的领导班子，刚刚改造，刚刚成立，时间不长，学校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朝农就真正走上了正规了。学习大寨呢，已经轰轰烈烈，学校的各项工作大有改观，现在，我们正以动大手术的精神，一动到底，决不留后遗症，下决心动手术就动这么一次，不光要院一级的领导班子要动，中层的班子也要动，下层的班子还要动，一句话，这样做就对啦！上层建筑部门，必须大胆百倍的采取组织措施，改变阶级成份，加强党的班子建设。其实资产阶级搞右

倾翻案，他们最注意的最关键的就是在党的组织路线上搞右倾翻案，这一次右倾翻案他们就是这样干的。所以，要保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施的执行必须采取有力的组织措施。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反攻倒算惯用的王牌，也是我们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所以，我们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反我们党组织路线右倾思潮，狠批党的组织路线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克服头脑中的模糊观念，更重要的是要狠狠的批判，我们党以至我们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上仍然严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必须把党的组织路线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的威风扫地，正是因为在我们党的组织路线上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而且还远远没有受到批判，好多单位甚至都没有接触，理论上没有搞明白，实际上没有批判，所以，导致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上不清，党的班子队伍建设不纯，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性质、目的和意义，没有严格地区分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派。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那些民主革命派，论其社会性质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边，由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派，要他们掌权，历史必得倒退，由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掌权，革命就将发展，这种前进与倒退的辩证道理，通过了儒法斗争史的研究，连刚一上学的小孩子们也都能够懂得的一般道理。

要分析在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的民主革命派，需下很大的

力气的。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多数的同志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由于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当中，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主席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能够坚持继续革命，能够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为人民服务。对主席是有了一些阶级感情的，这样的老同志是完全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的，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这样的老同志是最可亲可敬的，也是很多的。第二就是在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有些人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弄懂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根本不同，根本的转变，他们还是一个劲的坚持偏见，继续在那里搞他们的民主革命，不搞社会主义，这样的人最容易犯右倾错误，最容易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绊脚石，这样的人确实有。再如，就是一些民主革命派，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就是由于他们自己对人民，对于革命战争时期有点贡献，所以，他们就由商品价值规律所支配，把自己的那点功劳，当成社会主义革命当中的高价商品，当了官啦，有了钱了，没有人再欺负他啦，有了舒服的日子过啦，不愁吃不愁喝啦，达到他们的目的啦，不想革命啦，就把社会主义当成了安乐窝，吃、喝、玩、乐，一天哪在那里打麻将，生活上逐步开始走上了资产阶级化了，逐步的量变到质变，思想政治路线上必然要搞修正主义，否定和歪曲马克思主义，不干社会主义革命，搞倒退。在组织路线上也必然的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另立司令部，开始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右派，这样的人出了我们党内就是修正主义分子，

这样的人当官就是走资派。如果他们不接受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教训，死不悔改，搞右倾翻案，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还在走的走资派。同人民同无产阶级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他们必然要对抗群众运动，运动以后他们就一定跳出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反对党中央，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直接发动的，所以，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那些民主时期的民主革命派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有一个最需解决的，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民主革命派向何处去？有不少的民主革命派，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中对于人民有功、有劳。但是如果也真的到了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的时候，当人民群众、当广大的农民分了他家的房子、分了他家的土地，分了他家的财产，他就一下把屁股坐在他反动阶级、反动的家庭、反动的老子那边去了，对抗土地革命，反对土地改革，对抗社会主义改造，也必然的不搞社会主义，混社会主义，搞修正主义。为什么这样的一些民主革命派，一下立场就能够转变的那么厉害，为什么一下子就站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面去了呢？就是因为，这个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性质、任务，它们的目的宗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有个立场问题没有解决，关于民主革命派的问题，这个呀自己理论水平很低，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应当注重研究。现在在我们党内的那些民主革命

派，他们最大的特点，共同点，就是不承认基本路线，不懂的路线的斗争，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最容易成为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的人，也最容易转变成资产阶级的人物，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这些不继续革命的那些民主革命派，在现实的革命阶段当中，他们都是搞今不如昔，厚古薄今的，他们的思想体系都是儒家的。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看作是极左的产物，把一切革命，尤其是文化革命看得更是刻骨，一点也不理解，甚至于连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两个字也不愿意听，听了难受，听了刺耳。复旧、倒退、厚古薄今，这就是他们的政治路线。在现革命阶段那些不继续革命的民主革命派，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往往是自命不凡，主观武断，搞唯心主义，搞经验主义，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走资派，就是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派的一个变种，也可以就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又是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党内出修正主义的一个大祸根。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用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去顶替党内那些固步自封的因循守旧的民主革命派，那么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是坚持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搞马克思主义、搞共产主义，还是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继续在那里边用民主革命的思想和宗旨，顽固地在那里搞民主革命，我看这两样人、这两条路线，也就是前进与倒退的我们党内的两条路线。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经过流

血牺牲从资产阶级那里边夺过来的国家政权，反过来去交给我们党内的那些民主革命派，去让他们掌权的话，在由这些民主革命派把国家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部门的大权，再反过来，交给那些所谓懂得科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去管理、去治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最大的阶级投降派。我们就要犯罪。一般地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那些民主革命派，他们到现在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教育革命，这一点是不令人奇怪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历史功绩，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符合历史的唯物主义，但是，我们可一点也不能够去迁就他们那些原则的问题，原则性的错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违犯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在咱们的革命的队伍当中，几乎每一个同志对于人民能够做一些有利的事，但是，如果你离开了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离开了正确路线去引导、任何人只强调自己的作用、自己的功劳，也只能是没有自知之明一种的表现。同时，如果有的人把他们过去战争年代里那些功劳，作为同正确路线相对抗的资本，那么，他的这点功劳，这点资本，就改变性质啦！就要走向反面，就要搞修正主义。在我们党内，真有这样一些人，特别令人注意的，当文化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当革命的造反派把他们拉下马的时候，真是好话说尽了，什么“彻底服气”呀！“永不翻案”嘛！“感恩不尽”哪等等，实际上从路线上不认账，理论上不服输，态度上他也没有服气。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犯了严重的走资派错误，运动当中，凭

着几句好话，掉了几滴眼泪，求得了人民的谅解，甚至表现得非常积极，到了现在，到了今天，我们比较明确地看到了，在焕发革命青春老干部队伍当中，还有这样一批政治骗子，由此可见，当初，他们哭鼻子，掉眼泪是在克己，今天，搞右倾翻案，就是在复礼、克己复礼，得志便猖狂，这就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路线。东郭先生和狼这是个历史上的故事，这个故事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提出了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历史的教训，尤其是在今天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讲，尤其不该忘记。这样的一些人上台了，人多了，势力大了，有了社会基础，还有组织保证，所以，不知天高地厚，得意忘形，他们一边疯狂地、狂妄地搞右倾翻案，一边用折中的手法，继续贩卖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个修正主义黑货。其实他们的种种奇谈怪论，也没有什么新鲜玩艺，都是我们党的八大、九大曾经批判的体无完肤的修正主义破烂货，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我们如果把他们现在的一些奇谈怪论，从他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奇谈怪论相比较起来看，也都是他们自己的老调重弹，仍然是以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以这个东西为基本理论，仍然以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为奋斗方向，推行的仍然是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的道路仍然是资本主义。毛主席说：“走资派还在走。”同志们可以回忆一下，尤其是在四届人大以后，敬爱的周总理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奇谈怪论急聚的增多，小道消息更是数不胜数，右倾翻案也达到了猖狂造极的地步，甚至公开化、合法化了，名正

言顺地搞反攻倒算。大家再回忆一下，一年多来，在我国政治谣言到处泛滥，把一些什么人物吹捧的神乎其神不得了，简直比主席还英明，把中央某些坚持正确路线的首长攻击的、造谣的、污蔑的一踏糊涂，真是唯我所用，我们看，这些谣言的出现，这些奇谈怪论的出现，就是我们党内路线斗争的前奏，也就是在我国复辟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的舆论准备工作，他们做的很好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前些日子在中央，单就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的黑信问题发了一个文件。中央召集一些老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打招呼会，我活了二十几年，这个打招呼会还很少听到，什么叫打招呼会呢？现在据我自己的理解，我看呢，这个打招呼会就是给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打招呼。给那些还在继续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干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些民主革命派打招呼。给他们下场毛毛雨，打个预防针，应当清醒清醒嘛，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不要自不量力，不要没皮没脸。紧接着又发了一个文件，向全国宣布，对反党分子陆定一，宣布最后的处理，也就是政治死刑，大家想一想，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处理的死狗陆定一，为什么要在今天处理呢？自己看，他有着非常生动的现实意义，我们那里是这样理解的，处理陆定一，就是象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们，斩首示众，杀陆定一这个小鸡，给那些蠢蠢欲动的；反攻倒算的搞右倾翻案的那些猴子们看一看，看谁还敢翻案，看他还跳出来反攻倒算，没皮没脸的，不识时务者，和陆定一一样，就是下场，这才是无产阶级的铁的手腕。因而，我们必须大

胆地把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从我们的教育领导岗位上赶快撤消，宁可提拔应用那些对旧的教育接受不多，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经验缺少的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党内堆集的垃圾清除出去，新鲜血液才能充实进来，如果我们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各个单位都能照这样做，我们看形势一定会大好的。这样做也不是我们独裁，这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请客吃饭，这是教育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是在用最有力的办法，用组织手段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一句话，无产阶级的国家这样做，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理所当然，资产阶级搞复辟，总是在党内找他们的代理人，总是首先从组织方面采取他们的措施，其实，这一招倒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发明、创造，有些人他们都是这样干的。话又唠回来了，咱们铁岭农学院搞教育革命，没有很好的经验，但就采取有力的组织手段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辽宁省委的一条好经验，如果全国的教育部门，全国的大专院校，都能够这样的，果断地采取措施，那么形势不知该有多好。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危害是很大很大的，几位大人物，几次讲话就把我们全国闹的人心慌慌，好多省都程度不同地往回扭了，倒退了，可见，在我们党内，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就是我们国家出修正主义的最大祸害、最大危险。以上我们谈到的是上层建筑领导权问题。

再想谈呢，就是我们教师队伍的状况，对于我们的教师队伍应

该有个很好的估计，想重点谈一下，尤其是大专院校原有教师队伍的问题。

我们认为旧的教师队伍当中的一些教师，他们基本上 是爱国的，是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的，有的愿意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地看到，在他们的队伍当中，大多数人阶级出身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前半生所受的教育是封资修的。他们十七年搞的教育路线也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从旧中国带过来的旧的世界观，还远远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当然了，是在向无产阶级来靠拢了，为什么？我们强调旧的教师队伍的世界观，为什么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无产阶级的新的教育大军还没有造就出来，我们文化教育工作当中，尤其是一些具体的业务工作当中，教学工作当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往往掌握在他们手里，这是个实际情况。所以，我们要对旧的教师队伍进行团结和改造，和大胆使用，要这样的话，就必须对这个队伍有一个基本估计，知己知彼嘛，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中央一九七一年的四十四号文件两个基本估计，也就是对知识分子队伍的阶级分析，没有任何恶意。解放初期，我们搞土地革命的时候，都是凭着土地、房产、剥削率来考察他们的政治态度、考察他们的阶级立场，来划分成份。到了今天，怎么划成份呢？现在公有制了，基本上是公有制嘛，如果我们再用过去的办法划分阶级，搞阶级分析的话，那么，一般的农民，一般的人口多的工人，恐怕都是无产阶

级，挣钱多的，分值高的农民，恐怕就成了中农啦，成了小资产阶级啦。所以，我们对待教师队伍的阶级分析，就必须在思想路线方面，也就是在世界观方面，必须有一个阶级分析，必须搞一个基本估计。有些老同志听到有人把他们划到归属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知识分子范畴之内，他们就不高兴了，甚至于背后骂娘，真不应该，实在不应该。其实也不用别人说，就是请这些老教师同志们自己去掂量掂量，究竟在你们的头脑当中，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究竟是资产阶级思想占上风，还是无产阶级思想占主要地位，请问有几个老教师能够站出来说，我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恐怕不多吧？最起码百分之八十的这样的老教师不敢站出来，这一点切实是实事求是的，咱们又不是一定要你说你是资产阶级分子，不是那么个问题，咱们是在搞教师队伍的基本估计，是在世界观方面的阶级分析，这样的话，能够有力地、促使我们努力地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向无产阶级方面来靠拢，也有利于我们对于旧的教师队伍去团结、改造和使用。对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基本估计，有的人，尤其是一些老教师同志，不服气，这些人不服气，我们却是很服气。这个事，我都服气。在我的头脑里边就有不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过，再多恐怕也达不到百分之七十吧，基本上还恐怕不是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使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放过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也不能放过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因为咱们是在搞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是格格不入的，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阶级的

世界观，不能捏在一起，必须划清界线。所以，我们把主席说的，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这是个真理。所以，咱们在学校里边，在班级里边，经常地开门整党，进行了党内整风，班级整风，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我看哪，都是这个目的，都是在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全面专政，所以，就得衷心地希望这些老的教师同志们对于这个基本估计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应当主观上自己去积极地改造自己。毛主席说：“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我们理解，教员的问题，主要还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教师队伍的世界观解决了，其它问题，教育革命啦，教学改革啦，教学工作呀，都会迎刃而解的。因为澄清了思想路线，所以说教师问题，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严重存在的问题，必须注重的解决，正如列宁同志所讲的那样，第一改造旧的教师队伍；第二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教育大军。改造当中进行培养，培养当中还得注重地进行改造。我看呢，这就是培养和改造无产阶级教师队伍的一条基本方针。尤其是经过文化革命，经过教育革命，有一些老年教师真是焕发了青春，他们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划清界限，吸取了一些反面的教训，又吸取了一些正面的经验，在教育革命当中表现的非常积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令人高兴的是，一大批年青一代的教育革命积极分子教师，也在不断地成长。关心我们国家大事，关心教育革命的这样一批积极分子越来越多了。不过，不管怎么多，这个队伍同我们形势的需要来看呢，还不大，还

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队伍，很多的人，大多数人对我国的教育革命这个新形势还不能够适应，有的甚至格格不入，这也是个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愿意走老路的人不多，习惯于走老路的人可真不少，这就是教师队伍的基本状况，再有，我们这个国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并存的这么一个国家，小生产已经是汪洋大海，这个小资产阶级固有的那种知识私有观念在人们的头脑当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知识私有观念就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我国的经济基础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非常顽固的现象，这也是修正主义教育思想、教育思潮、修正主义思潮，一遇合适的气氛条件就极度泛滥的危险因素，总而言之，资产阶级在武力上被我们打败之后，生产资料被我们剥夺之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教育领域就开始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的最后领地。也正是在这个领域里边，资产阶级还占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党内走资派，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要在我国复辟，是有着很深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有着修正主义良好生存的肥沃土壤。也正象姚文元同志所论述的那样，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也仍然存在着出现修正主义的深刻的社会基础，加上帝修反遥相呼应，再加上我国的教育革命是世界上没有过的教育革命，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苏联搞了一次，也没有搞成，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一个样板，只能去完全依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去探讨、开创教育革命的新途径，这个新生事

物，缺少经验，存在不足，有薄弱环节，所以好多问题，好多薄弱环节，就很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可乘之机。

所以说以上所说的一切，就足以说明，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最大最大的危险也仍然是修正主义，大家都知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我国的教育阵地开刀的，然而，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他们也完全可能从我国的教育战线打开缺口突破，一九七五年，也就是今天，在我国又突出的出现了一场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形势非常好，现在，社会主义祖国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在党的领导下，全体人民群众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寨人的精神，充满信心地奋斗着，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深入，二十世纪末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将有一个高度发展，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真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形势一派大好，也就是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在人们欢天喜地地为了早日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这么个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下，资产阶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向我们的反攻倒算，首先拿教育阵地开刀了，而且首先拿毛主席亲自抓的两个学校，清华、北大开刀了，在全国的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的妖风，这一次右倾翻案风，周荣鑫是罪魁，祸首是谁呢？咱们不知道，这一股右倾翻案风有点象五八年修正主义要扼杀我国教育革命，那个时候那股来头，有点象刘少奇要疯狂砍断三面红旗的那股架势，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那股思潮要利害的多，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是

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再次猖狂进攻。肯定地说，这次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是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在党内就是路线斗争，是党内第九次，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继续，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是党内的长期路线斗争当中的又一次的突出表现，大家都记得，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向党猖狂进攻，我们搞了一次反右斗争，我们看，今天反击右倾翻案，其性质和反右斗争是一样的，当然了，这次右倾翻案风的刮起来主要还是表现在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集中地体现在走资派身上，正因为清华、北大是毛主席亲自抓的两个典型，所以，走资派为了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革命的案，攻击毛主席，就拿这两个学校开刀。咱们辽宁省因为在教育革命当中也坚持了正确路线，搞出了一些新鲜经验，所以，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成了走资派，这个否定文化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开刀的一个重点，自己是一个辽宁人，决不是我们自卖自夸啦，几年来，辽宁省委执行主席的教育要革命的指示，理解主席的教育思想，都是比较认真的，比较坚决的，我们还创办了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农大——朝阳农学院，也就是说，辽宁在我国的教育革命当中，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和贡献，所以，搞右倾翻案的人们，就要首先砍断朝农这面红旗，借以全盘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文化革命，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份到十二月份，在咱们辽宁，最严重的还是在十月份和十一月份，小道消息可多啦，咱们这些学员

在山沟里的大学里边消息闭塞得很，但是，我们有的好多的教员，他们的消息特别的灵通，真是四通八达，他们可能是拿到了周部长的讲话，所以，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出来了，过去对待教育革命，一直不热心，不出力，抱有抵触情绪的人们，却从来也没有过的活跃起来，高兴起来了，这一支一直保持沉默的、消极的教师队伍，开始发表讲话了，有些人好象要恢复十七年统治学校的那股元气，腰杆子硬起来了，有点不服管了，好象应该轮到革造反派的命的时候了，反攻倒算，恐怕有朝一日了，他们听到了上面有人喊，说要有热心于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对下边他们就胆敢指名道姓地大骂工宣队。上边有人喊说，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是对的，但是强调过分了，他们下边就胆敢把工农兵学员的组织踩在脚跟底下，他们说，工农兵上管改，就是上大学，管自己，改造世界观，这是屁话，上边有的人说，基础课的教师都成单干户了，等等、等等，下边就有的人提出来，要恢复老三段教学，要重建基础部，恢复旧的教育制度，那时候，自己感觉很深，过去，因为我多多少少地在学校里边还负点责任，当一个所谓的头头，好多人对我还是比较谦虚，说一些好话，给点笑脸，这个时候，笑脸不见了，好话也听不到了，有点冰冷冷地，那些日子，吃饭吃不下，睡觉也睡不实，半夜睡觉老作梦，作梦不作好梦，死爹死妈，天昏地暗，好象中国要变天了一样，好象有人掐我的脖子，要掐死我一样，再加上咱们学校条件不好，半夜冻醒了真是觉得寒气逼人，到了十一月的中旬，

那时候的压力就更大了，半夜睡不着，就想问题，想的可多了，开会也开不下去了，就到外边走一走，和同学们谈一谈，谈的也特别广泛，我们和同志们谈到了这一次这股来头，非同小可，这是一次斗争，非常严重的，大家从学校谈到社会，从辽宁谈到北京，从小人物唠到大人物，从文化革命以前唠到文化革命以后，从过去唠到现在，又推测将来，越唠越觉得问题的复杂，问题严重，越觉得事情的后果特别可怕，在十一月的二十号，上课也实在上不下去了，我就给同志们写了一个小条，在条上写着，大概内容就是写着有人要反攻倒算，而来头不小，应当反击，就是这么个内容，十月份，咱们班级的同学，对“教育革命通讯”第九期，进行了研究，有很大争论，在全班组织过讨论，观点没有达到统一，因为过去咱们班级写大字报，观点都是一致的，这一次就产生分歧了，分歧还很大，认识问题没有解决，第十期一发表，所以很自然地就引起了咱们班级的同学们的重视，引起了咱们班级的讨论，这个教育革命通讯第十期刚刚拿到手，看到第一篇文章，就觉得大有问题，看这个题目就觉得不是一般的问题，“教育革命通讯”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篇评论，评论的名字叫“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当时我看到以后，我说什么正确的道路，仔细一分析，看一看内容才知道了，什么正确道路，言外之意，就是以前的路子不正确，没解决好，我这个是正统，我这个是正确的，就是修正主义，那篇文章里第一段就谈到大好的经济建设形势，给人们的影晌就是缺文

化，缺科学，缺人材，然后用四段的篇幅，大抄中央文件，抄四十四号文件，他们要宣传的倒不是中央一九七一年的四十四号文件，他们其目的就是要抽掉四十四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利用一些方法性的问题去扼杀。

一九七一年以后，五年来教育战线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就是这么一个罪恶目的，紧接着又抄了两段导师的讲话，列宁的语录，我们看它要说的不是导师的话，是他自己的话，绕来绕去的，在最后说实话了，形势逼人哪，怎么办哪，同志们要想一想，最后一段提出问题，又解答了问题，用主席语录解答的问题，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恶毒，什么需要科学家呀，新闻记者，工程师呀等等，就这么解答问题的，整篇文章充满着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观点，目的是非常险恶的。同志们马上就印制出来，问题严重，同志们也就马上就认识了，马上就给这篇文章下了定义，是一株大毒草，然而，也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大毒草，这篇文章却被有些人捧为珍宝，大吹大捧，因为这股翻案风反映了他们的心理状态，说出了他们的咽到肚子里边想说的，又不敢说的话，适应了他们的世界观，加上部长大人讲话，一些消息在他们的耳朵里边已经灌满了。也认为教育革命是过头了，搞糟了，应该矫枉过正了。所以在我们学校里边，就有一位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放心大胆地在政治课的讲台上向学员们推荐了“教育革命通讯”第十期第一篇评论，说这篇评论对于我国的教育革命有着指导意义，说这篇文章对于我国教育战线

上是我国教育战线上重新调整政策的一颗红色信号，高度评价。然而，同学们听了以后就觉得非常气愤。什么红色信号，他是绿色信号，是绿灯。有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危险。必须不顾一切加以批判。也就是在这位马列教员推荐的第二天，我们工农兵学员代表也毅然地登上政治讲台，对那位马列先生的观点提出针锋相对的辩论。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向国家教育部主办的权威刊物提出严厉的挑战，尖锐地批驳。驻院工宣队的师傅们，工宣队长立即站出来，当场表态，热情地支持我们，鼓励我们，而且坚决地站在我们一边，就这样，在我们学校里边一场革命大辩论就开始了。开始就在咱们一个寝室里边，晚上一辩论到半夜，同学们各不相让，吵吵嚷嚷，其他班级的同学，因为住的是楼房，影响人家睡不着觉，都向咱们提出抗议，敲窗户，有的女同学跑到咱们四楼上来给咱们调情，还叫不叫咱睡觉啊！吵吵嚷嚷的干什么呢？所以很快地，咱们班支部就看到这个问题了。就因势利导在全班范围内组织了一场大辩论。咱们班级党支部很快就达到了观点的统一。在大辩论会开始以前，因为我是班级支部书记，给大家提出几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也就是表态，我们争论的是一个严重的路线问题，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发言，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是认识问题，这一点必须肯定。第二不许讽刺挖苦，不许搞人身攻击。第三请大家不要被文章的内容约束，要从战略上，从路线上去看问题。第四针锋相对两种观点，不以个人名义和战斗队的名义发表，以班级教管小组的名

又统一发表。紧接着就给大家提出几个思考题，一共有四个思考题：第一个我就讲“教育革命通讯”一共办了三十多期了，为什么七五年的第十期反响这么大，那么引人注目，那么令人高兴。第二，如果一九五八年我国教育革命一直胜利到今天的话，请大家设想一下教育革命的形势应该有多好。第三，“教育革命通讯”那篇评论与沈阳机械学院第一张大字报有什么区别。第四，和我们班写的大字报有啥区别。就这么四个问题。这次大辩论全班同学都动起来了，从来形势也没有那么好，同学们纷纷地翻马列、马列著作，翻中央文件，把三十多期“教育革命通讯”都搬出来了，从头研究，但是，比较遗憾的，对待这篇评论，这株大毒草反动的文章，持赞成观点的同志占上风、大多数、绝大多数。批判派的很少很少，当时学校领导比较重视，咱们总支领导就决定，把这篇通讯打印，人手一份，在全系范围内展开大辩论，这次辩论在一个班，一个寝室，一个系里面辩论也辩论不清楚，没有把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所以，当时我就和领导同志们商量，要发动一场全校性的大辩论，所以，过去一般那一个集体里面，那一个班级里面都存在一点派性、宗派，这么一辩论宗派就打开了，形成两个学派，一个是辩护派，一个是批判派，很快地两个派别就扩大到全校。辩论到高潮的时候，学校的两派，各选派自己的代表，能说善讲的同学，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展开全校的一个大辩论，在会场上都是用的麦克风进行辩论，声势比较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但是，毕竟批判派还

是少数，辩护派势力雄厚，嘴也多，道道也多，他们都分析说这篇文章实事求是，充满着唯物主义，说我国的各条战线都在调整政策，都在找差距，教育战线也跑不了，说运动快搞完了，应当安定团结了，落实政策，教育革命就是矫枉过正，就是这么个问题，群众运动都是这样，都是这么理解，对待教育革命的形势有点厌烦情绪，不太理解。当时批判派同学压力特别大，有点吃不消，那么多的嘴，周围都是辩护派了。两派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各不相让，连一个裁判员都没有，到那儿去说理呢，压力确实太大，尤其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关键的时刻清华北大的文章发表了“教育革命正确的方向不容篡改”。当时正是早晨六点半钟，同学们上操刚回来，窗户一打开，同学们都提着个耳朵静听，饭都不吃了，越听越高兴。开始的时候，辩护派的同志们都说你看看，有人篡改了啦，篡改了正确方向啦，他也不知道怎么篡改的，还是谁篡改的。后来文章播到有四、五分钟以后嘛，这些同学就觉得不是味，就有所察觉。当时咱们班级批判派的同志，有一个小同志，二十三岁，就从二层床上蹦下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到各屋奔走相告，胜利了！这次斗争又胜利了！我听了以后，尤其吧那个广播员是中国第一流的广播员，用非常激昂的声音播送的，高兴得不得了，来到我们寝室里，我就喊，这可好了，我说这才是一个红色信号，这个反击全国都动起来了。听到两校的文章发表后，批判派的同志们欢欣鼓舞，趾高气扬，扬眉吐气；辩护派的同志们就有点受压，有点

难受，因为当时他们正处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之下，正在得意的形势之下，所以，听得两校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大吃一惊，马上就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文章不是孤立写出来的，不能单就文章论文章，不能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能进行一般性的辩论。所以，全班同学全校同学立即统一了认识，一致重新用批判的观点共同去批判“教育革命通讯”第十期，批判那些奇谈怪论，好多同志就说，无论如何，怎么样我也没有认识到这篇文章是这么大的问题，这场斗争啊，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斗争，而且也没有认识到这个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所以，在咱们的总结会上，多数同志们都喜欢作个检查，当时也是有点谦虚啦，有些同志还讲，我的观点错了，我们应该投降，应当接受“招安”，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观点错啦。当时我就觉得，同是一个班级的同学，都是认识问题，这么讲话，这个倾向不好。所以，我就掌握会场，就向大家讲，我说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没有被篡改，教育革命的成果没有被否定，我们大家都胜利了。同时，我就问同学们，为什么这次大的路线斗争能这样快的取得一些胜利呢？为什么呢？因为党的基本路线，因为历史的经验，人们都没有忘记，更尤其是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咱们是背靠大树，毛主席健在什么都好说，在这场紧张的大辩论当中，我根据同志们的发言纪录整理了一篇文章，这个后来就登在报纸上了，登在《人民日报》，那不是答卷的全文，咱们《辽报》登的是全文，在文章的前面还加上了张铁生的名字，实

在不应该，有点贪天之功，其实呢，是咱们大家的认识，全班同学的观点，我不过是及时地反映出来了就是啦。

沈毅：我简单地就这问题说明一下，当报纸发表了铁生同志的新答卷以后，议论不一样，绝大多数同志都很高兴地看到铁生同志几年来，由于自己主观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由于自己能够在斗争当中不断的继续革命，在这一次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当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大家很高兴。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有种种的想法和看法，其中有比较突出的一个想法，因为铁生同志，这个新答卷的写出恐怕不是他自己的文章，更有怀疑者因为铁生同志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他肯定和中央某些领导有单线联系，所以这次大辩论，这次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刚刚形成，恐怕他就有了了解，上级有个别领导跟他单线联系告诉他了，所以有这场斗争啦！所以，张铁生能够在斗争中写出一个新答卷，这个情况，我们以后呢确实也遇到一些同志，有些好心同志向我们打听，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事情我们还有点发言权，比较了解，铁生同志要说有单线联系呢，这个只有我们知道，一点没有。他有联系的只有他那个生产队，他现在仍然还是他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因为张铁生同志上大学呀，不是为了扩大差别，而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当一个好农民。铁生同志有句话，他上大学是为了农村，在学校想农村，大学毕业回农村，坚决当一个好农民。他对他那个生产队是经常有联系的。每年他要回去三至五次，安排生产队的阶级

斗争和路线斗争，直接抓，安排生产。即使不回去，他每年要给生产队写信四五十封，每一封信讲得非常高，讲到路线问题，讲到阶级斗争问题，讲到生产斗争问题，非常关心那个生产队。他至于跟上面一些领导同志确实有些接触，因为他经常开会，有些接触。他接触到一些问题呢，他能够很好地来进一步来研究。怎么很好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同时呢，也正因为 he 接触一些问题，他就研究一些问题。比如他关于这次右倾翻案妖风，他的察觉前后，他这个新答卷的写出，这个《辽宁报》的发表是以十一月二十九号这天，作为这一天发表的。因为这一天省委领导同志拿到了，省委领导看了以后，感到铁生同志这个观点明确，路线清楚，很说明问题。实际这篇文章是他在十一月二左右就写出来的，已经写出来了。为什么发表在二十九号呢？这里有个过程，他当时，他方才不是讲了嘛，他组织同学，他现在除了是院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以外，他又担任班党支部书记，他组织这个班进行教育革命大辩论，特别第十期发表以后，在他这班掀起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同学们在争论当中，相持不下，张铁生同志引导了一些同学怎么样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在这个当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为什么能够很敏锐地觉察这些问题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张铁生同志他能够积极地努力地去刻苦地读马列、读毛主席的书，他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不是在十一月份才察觉的。对于一些小道消息，一些奇谈怪论，他在八、九月份的时候，他就有所察觉。我记得他在这个八、

九月份曾经到省、地开了几次会，开会回来的时候，因为在会上也传达一些人的讲话，也看过一些讲话，回来他就给我讲，他说，我怎么看这些人的讲话，我觉得怎么很难受的呐，觉得味道不对呢？什么原因呢？当时，说实在的，我们也只得跟他一般地谈，对这些我们的认识也不清楚，况且加上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也不敢大胆地很放肆地去讲这些问题，所以他只能自问自答。作为我们只是跟他一般地谈一谈。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就积极去翻主席著作，翻马列的书，他是不分黑夜白天去读书，抽点时间就读书，在火车上，汽车上，在走路，在学校中午休息的时候到山沟底，因为我们的学校现在是在一个小山沟，在山沟里的树根底下去读马列著作，看毛主席著作，看列宁的有关文章，通过这个来解决他当前一些认识问题。所以，教育界奇谈怪论一出现以后，他就看得比较清楚，他也很气愤，所以那一段都象同志们说的，铁生瘦了，确实那一段瘦得很邪乎，他非常感到压力很大，问题也很多，怎么样组织大家反击这次右倾翻案风，他想得很多，确实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方才他已经讲了，他不仅在这方面有觉察了，一会儿他可能要讲，你比如他对当时报纸、电台，也曾经也讲过，以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也就是说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个指示为纲，他对这问题他就认为是不对头，他认为这样讲，这就没有纲啦，抽掉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这个纲，这究竟什么是纲，这个事情他给我讲了就不止一次，所以，他认为当前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所以他的注意力呢，就注意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高度上来了。所以，在辩论这个基础上呢，所以就很快就写了这样一个文章，这个文章的形成，当时因为没有到省里，省里也没有开会，这个学校教育革命比较紧张，所以铁生同志也就没有把它拿出来，他整理个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去，我们辽宁省是在十二月一号到五号，省里开了一个干部会，这次会议是由省委常委、各市地委第一书记和各个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工宣队长这么个干部会，这次会议专门来讨论教育革命问题。

我们接到通知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就是这样，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到通知，要求我们学校派两名同志参加会议，和地委书记一道在省里开会，铁生同志对这次会议很重视，因为他也摸不到这次会议到底研究些什么问题，但他知道既然要大专院校开会，当前这样一个形势，因为当时清华、北大两个学校的大批判文章没出，大批判文章出的是十二期杂志，这是十一月的问题，他也感到究竟当前我们辽宁省委抱着什么态度，他就跟我们学校的到省里开会的这个负责同志讲了一下他的意见，反复讲，说当前这个斗争可不能是一般斗争，希望你到那儿一定要站稳立场，要斗，他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结果，他说一定要站到清华北大朝农这一方，即使省委要是动摇了，我张铁生也得跟他拚，不能动摇，希望你别动摇，跟我们这个负责人讲的，对我们这个负责人很鼓舞，完了，这就是天气就已经很晚了，他就回去了，回去躺在床上睡不着，翻来复

去睡不着，睡不着看书，看书完了再想，怎么想怎么觉得去两人开会仅跟一个同志说了，工宣队长到底是个啥态度，他还不摸底，他到知道工人阶级一定能够站稳立场，一定能够在这个斗争当中冲锋陷阵，他在这次在小将上讲台讲政治课，工宣队长首先站出来支持的，当然这一次省里头别屈服于压力，省里头这次会如果弄不好，咱们也都倒向一边，反对起朝阳农学院，反对起当前这个新生事物，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所以，他第二天早晨别人都睡觉呢，他四点钟就起来，他一宿也没怎么合眼，起来披起棉袄他就去找另外一个同志，因为他住的地方和我们工宣队住的地方相隔有三里多地，中间隔一个山包，路还很背，另外一个同学，就是大家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个，就这个同志和他一起，就到工宣队师傅的住地。到哪儿嘭嘭敲门，这把人敲毛了，这是干什么啦！这么早来，问：“是谁？”说是铁生。这工人师傅正爬在床上，他就进来了，他就给谈。他的指导思想就是一个工人师傅，你不能动摇，坚决顶得住，这次斗争一定是很严重的，我们一定要站在朝农这一边，即使省委变了，我们也不能变，我们坚决斗争到底，这是翻案，这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翻教育革命的案，这是对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不能答应！跟那个师傅谈了三个多钟头，四点多钟到的，七点多钟要吃饭了，工人师傅说，你就回去吧，你讲的那么多我记了一些，但是我还记不住，你是不是能写个材料我带着，这样我到那儿说话更有依据，拿着东西我上去讲去，铁生说，行！这样

回来他早饭也没有吃在宿舍趴着写，十一点钟就要到我省宾馆开会，说十一点以前就交给他，不交给就晚了，下会就开会了，铁生回来饭也没吃披着棉袄趴在桌上一气呵成，把原来那个大字报重新整理一下成了这篇文章，这是报纸发表这个答卷。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有点发言权的，知道铁生在成长过程中，确实是由于自己主观学习马列，学习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中和路线斗争中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能够继续革命，补充一点说明一下，完了。

张铁生：我讲话没有充分的准备，加上口音大家听了也不习惯，主要吧讲话质量不高，好放炮，再加上自己牙齿长得也不整齐，说话有些漏洞，在咱们那个学校里边我讲话吧老有些负担，由于咱们那个学校有些人记我帐，他们说，张铁生的每一次讲话我那块儿都有记录。言外之意就是说你那个小子呀，讲那么多错话，到时候跑不了你，咱们这个屋子里面没有没记我帐的人呢？反正也不敢讲，恐怕有也不多，讲话比较放肆大家谅解一点，我就随心所欲，想啥讲啥，教我尽讲那些保险的话，唱些高调子，我还没学会。在大辩论当中，尤其是受压的时候，心情和一九七三年进考场考试的时候，是同样的激动，心呀蹦蹦地跳，当时我就和同志们说，一九七三年，咱们省委，为了回击修正主义回潮，捡了一块石头，回击回潮风，今天呀，我们要做一把钢刀，直刺教育部，就这么讲，所以通过这次斗争，使我认识到很多问题，方才咱们领导同

志讲了，有些人猜疑我有什么单线联系，确实是单线，没有双线，和主席的革命路线呀，有着直接的联系，紧密的联系，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格格不入，我深深地认识到，我是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被人民群众把我推上政治舞台，如果这一次周荣鑫他们搞的一次右倾翻案风得逞的话，周部长继续当部长的话，那么这个小人物，就得成为一个殉葬品，就得会被从政治舞台上拽下来，打下来，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断头台，立即宣判我的政治死刑，下场也就只能这样，所以对这场斗争更加认识到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自己也清楚地理解到：反动的阶级对他的叛逆者，深恶痛绝，这我们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这些家伙们，都是仇恨新生事物的专家。都是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顽固派，对于他们的顽固性，残忍性，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人，只有亲身参加这场斗争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这次修正主义要复辟的出现，仅仅又一次地说明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只能达到这么一个目的，没有得逞，远远没有得逞，只是又一次对人民群众，进行了最现实的最生动的路线教育，在总结发言的时候，咱们有一位同学讲，说以前吧，我就担心，技术知识学不好，回去对不起贫下中农，他说我就是看不到自己的路线觉悟低，政治上糊涂，上当受骗，跟着反动的思潮跑，能够对得起谁，同学们讲的非常深刻了，在总结发言的时候，咱们师生在一起共同的再一次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老师讲，他说呀，十七年的时候，资产阶级也是打着关心我国的国家前途呀，

关心科学事业的发展的这个旗号，所以他们名正言顺地宣称，说学校就是培养什么所谓红色专家的地方，红色专家的摇篮。但是，十七年的事实呀，回答了我们，所谓的红色专家，其实呀，就是戴着一个红帽子的，也就是一个戴着红帽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所谓的红色专家，剥去画皮剩下的也只能是骗人的说法，如果说我们还象十七年那样，按着那个路线去培养红色专家的话，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为现实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说，他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唯心史观之中，我们连半点都不能够信赖，因为我们有十七年的沉痛教训，就够了，够够的了，咱们也不是凭着赌咒办事的教徒。那些反动的文人们，所谓的科学救国、技术决定一切等等论点通通都是鬼话连篇。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决定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才能使这个国家永不变色。

“学而优则仕”、“智育第一”，这纯属于资产阶级特别顽固的偏见，这一点，人们很好理解，但是，资产阶级又总是把读书无用，撒手不管，这个坏现象，罪归给咱们教育革命派，他们总是这样干，其实，“学而优则仕”与“读书无用”，搞“智育第一”和不抓智育，这是资产阶级的两个极端表现，一个极右实质，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教育革命的两种手段，两张王牌，他们都是来自于修正主义的反动的教育思想体系。

所以，如果咱们不是认真地看书学习，不能够端正我们的学风，没有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辨别能力，光凭着咱们这一点朴素的阶

级感情来办事，我看也只能是上当受骗，给修正主义危险出现提供有利的条件，资产阶级搞形而上学，历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边批判智育第一，他就说我们不抓智育，我们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实质，他就说我们不要教育，我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他就说我们不抓生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今天，他们又趁着无产阶级崭新的教育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还没有完善的时候，他们搬出了一个教育质量的问题，捡起这些鸡毛蒜皮来吓唬人，我们说看质量嘛，应该首先看政治质量，要看方向，看路线，看学生的世界观转变程度，决不能以上了多少课时，读了多少“本本”为标准，周部长他到基层很少去，辽宁也没去过，朝农还没去过，他说教育质量，他对教育质量进行评价，没有发言权，要是有了发言权的话，只能说造谣污蔑，否定文化革命，咱们这些直接参加教育革命的，参加开门办学的，是最有发言权的，我是学兽医的，咱们实行开门办学也有很多的事情也愿意跟同志们讲一下，咱们和他俩讨论教育质量问题的嘛。我们班开门办学到一个县兽医站，这个县兽医站呀，有一个老权威，六十几岁了，大概是六十六岁吧，是他们县里边顶顶有名的，出大拇指头的，这么一个权威，去了以后，对咱们比较冷淡，搞知识封锁，技术垄断很厉害，什么也不告诉咱们。有一天，一个生产队拉来一匹马，这个马得的是结症，恐怕多数同志都知道结症是怎么回事，相当于人的肠梗阻，吃的草料结到肠管的某一个部位了，再也下不去，非常危险，容易使肠管破裂，造成死亡，这

个结症，老大夫要决定进行手术，当贫下中农听到他要手术，贫下中农就在他跟前央求，老大夫呀，无论如何这匹马也不能手术，这个马已经二十多岁了，是个老马，一手术花多少钱咱们不说，治好治不好咱们还不说，就算你治好了，可是这个老马经过这么大的一个手术，剖腹手术，基本上也丧失使役能力了，如果你要手术话，我们就回家给它一刀子算了，我们就吃肉了，大夫不是那么想的，他想的不是咱们贫下中农的财产。他想到我是一个兽医，我的本职就是治病，我就管治病，我还管你使役呀！我不管！把你的马病治好了，把它的命救活了，我就完成我的本职工作了，他就是这么想的。再一个想法嘛，就是考虑到手术是比较高明的，别人都认为是比较奥妙的，他是一手垄断的，要用其它办法都非常危险，不见得治好。有一个治结症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掏结，把手从后边伸到马的直肠里面去，把那个结块，把肠子里堵的那个草团摸到，把它捏碎，然后达到治疗的目的。这个方法，第一危险，马的肠壁非常薄尤其长期肠梗阻，那块肠壁的血管都有坏死的可能，所以他不敢动，担心用掏结的办法把马的肠管掏漏了，马死亡了，丢名誉，有损于他的尊严。所以，他一定要手术，谁说也不行，当时咱们有一位老师在跟前，姓袁，贫下中农就苦苦地哀求咱们这个袁老师，说袁大哥呀，袁大哥，千万不能手术呀，急得把老师都叫大哥啦，咱们看到这个场面特别气愤，这个时候，这个老权威给社员们说，你这个马必须手术，不手术我就不治了，要手术的话，回去取钱，要

押金，这时候社员们说，我们也不同意手术呀，说不手术你就拉走。他那块正要钱啦，这一块我就把上衣脱掉，就用那种铁的手腕，掏结的办法，从马的后屁股里面伸进去，把这个结块就摸到了，不到五分钟，结块就捏碎了，肠管就通了，马的病就基本上治好了，他那块还要钱呢，我说老大夫呀别要钱了，不用花钱，病已经治好了，贫下中农感激的心情就不用说了，老权威受到了一次打击，受到了一次教训。第二天，也就是第二天，有一个生产队又拉来一匹病马，得的还是这个病，结症，来了一个队长，来了一个饲养员，还来了一个赶车的，老大夫还坚持要手术，咱们有几个女同学说，老大夫啊，咱们就别手术了，咱们还掏结吧，担点风险，不嫌脏，吃点苦就可以了，贫下中农还不用花钱。“不行！”这回能掏也不掏了，就这么大劲，我说了算的意思呀，我是个权威，我是门诊大夫，主治大夫。最后他决定手术以后，咱们同学就给他讲，咱们给你煮器件，给你递个针线，帮帮忙行不行，“不用！”咱们那个女同学回来就告诉我，这家伙可了不得，一定要手术，咱们给他打下手都不要，其实咱们也会手术，那玩艺咱们也不外行，这时候，老大夫已经把那个马推上了手术台，麻醉完毕，器件消毒也都完毕了，把手术蒙布都放上了，背毛也刮掉了，就准备来这一刀，在这个紧张关头，同学们都气得够呛，这个生产队长和饲养员急得团团转，不能手术呀，这个马咱刚买来，才两岁多一点，小马驹，这么手术，起码一年不能使役了，再也吧也真受折，不一定能治

好，马，大牲畜手术，消毒也不象人手术那么严密的，所以容易感染化脓坏死，急得够呛，看到这个情况，我当时正在开会，我就去了，到那儿我就赶上啦，我说：老大夫先别动，不能动，我说你等我一会儿，然后我就走了，也没有，我还好歹的有点法权，他还真还没有敢动，当时我就想，这是个无产阶级的兽医站、共产党办的，应当贫下中农说了算，就你这个老糟头子说了算？我才不服气呢？我就到他们党支部把副书记找来了，当面我就把他叫来了，我说你摆个理，你说为什么这个马一定要手术你摆清道理。他就把整个的病情啊，检查的过程啊从理论上摆了一大堆，从实践上还讲了不少，中心意思就是为他的观点辩护，讲的是悬天悬地的，他讲完我就讲，他摆他的方案，一定要手术的方案，我说不用手术，不花钱可以治好这个方案，最后还是不同意，最后我干脆我不跟你商量了，我说试试行不行，我说你说行不行，他说那就试试吧，他就这么一句话，咱们就干上了，出去以后，我就和同学们讲，我就和那个队长讲，我说咱们来掏结，不手术，咱们试试看！这一家伙同学们都活跃起来了。可真有人替他说话了，那个队长马上就帮助我拽马尾巴，同学们打来洗脸水，拿剪刀给我剪指甲盖。因为很危险，手指甲盖划破了肠管，掏破了粪便流到腹腔里去，这家伙中毒就会死亡的，同志们就帮助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当时队长就鼓励我，一边拽着马尾巴一边对我说，铁生呀你就干，反正这个马也得手术，咱们贫下中农啊，不会计较他的后果的，它死了，咱们就等

于杀肉吃。就这么讲。它好了，咱们感谢你。咱们争气。在这个老队长的鼓励之下就干上了，用了十来分钟时间，结块特别特别大，大面包的样子。很危险，用咱们比较先进的方法，咱们国家发明的锤结，就是把那个肠子里的结块，搂到肚皮的下边去，没有骨头的那个地方，外边用一个大棒子，把这个结块捣碎。非常危险。用这个办法，大胆地把这个马的结块捣碎了，结块一捣碎，前面的肠衣呀，前面鼓胀的空气呀，都顺着这个肠管都排出来了。这个大马呀，噼里啪啦排了不少屁，正式宣告这次路线斗争胜利了。真争气呀，同学们高兴得不得了，老队长呀就拉着那个马，说了那么多好话，高度地评价，哎哟，还是咱们自己的大学生哟。高兴得够呛，说实在的，你说你这个老权威怕丢名誉，怕把这个马掏死了，我就不怕丢名誉，我这个权威比他那个权威还大，但是考虑的倒不是这些事情，就怕给主席路线抹黑。真正掏死的话，这家伙就得意忘形的，不就向咱们反攻倒算，不就给咱们造舆论。担心的是这个事情。

再有吧，你说讨论，自然，从这个理论水平上来看，我和这个老大夫对比，说实在的，说老实话，差得很远很远。人家搞了好几十年了，我刚刚上学，理论知识不多，确实不多，实践经验呐也没有他多，人家搞好几十年了，这一点咱们如果不承认的话，咱们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呢，我们理论不多，可以继续深造，实践经验不丰富，可以大胆实践。我们讨论教育质量，决不能离开阶级内容，决不能抽掉他的阶级内容。为什么两个人，出现两个处理

方案。一个呢，不化一分钱，可以给贫下中农解决那么多问题；一个呢，化那么多钱，手术以后不见得治好，而且呢，还要丧失使用能力。这两个方案，你说那个高明？我说我这个方案高明，为什么出现两个方案，一句话，两种世界观针锋相对的，两个观点，两个立场，两种思想感情。他和贫下中农的那个感情呀，可我与贫下中农的感情呀，就那么两股劲，不一样，当时我想得很多，我对于这个大牲畜呀，尤其是对马，特别是有感情的。在农村呐，这个工作，接受再教育呀一共五年时间，还当过生产队长，咱们小队的牲畜特别缺少，病了，我拉了那个马，走啊走啊，治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确诊。咱们小队还穷，没有钱。今天借钱，明天化，明天借钱后天化，就这么给马治病，特别特别啊，那苦处不用说，我这拉着马呀，晚上还没有回来呢，社员呢，在那儿伸着脖子等着我，怎么还没回来呀？马病了究竟怎么样呀？还有希望没有啊？所以贫下中农那个感情我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愿意上大学学兽医，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我对待这个贫下中农，对待这个马那个思想感情呀就和那个老大夫，截然相反。谁知道，我看哪，谈论教育质量，必须首先看政治质量，看世界观。你说他那个质量不高，我说不低，还真不低。什么质量？资产阶级的质量真不低。他那个质量啊，是他的，是白色的、黄色的。咱们的质量是红的，无产阶级的。他要他的，咱要咱的，咱们要的是红旗，他扛的是白旗。你说谈到教育质量，脱离了基本路线，脱离了阶级性，讨论什么东西也

讨论不清楚，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能离开党的基本路线，人家说什么科研项目少，咱就摆了一大堆科研项目；人家说咱们理论知识少，哎，咱们就搞一套理论，等等。这些东西呀，从理论上没搞明白，被动、消极，摆质量就这么摆。首先看政治质量。所以吧，咱们谈论教育质量，有一个鲜明的阶级性。不管那个学校，不管是那个阶级，他们都是用自己的阶级利益改造学校的，都是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塑造接班人。试问，说文化革命以后学生质量低的这些先生们，请问你们，你们这个质量，那个标准，是不是毛主席要求的标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标准？是不是政治家的标准？是不是这个无产阶级广大工农群众的标准？都不是。谁的标准？是你的标准？是你那个世界观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标准？资产阶级的标准，把你那个标准啊，拿到美国去，我看也不新鲜。拿到苏联去啊，我看苏联那些凯洛夫的门徒们，也会拍手称是的，也说不出两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呀和他们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你们的自然观也都是资产阶级的，你们的教育思想体系啊惊人的一致。假如说，咱们如果真的按照他们的教育质量，象十七年那样去培养学生，我看哪，这样干下去，培养的学生，也只能是对我国的经济基础啊，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起极大的反作用，破坏作用，只能够在不断地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作用，只能够起到扩大三大差别的作用。既然这样，我们又为什么不怀着无比仇恨的心理把那些旧学校，旧的教育制度，砸他个稀巴烂呢。列宁同志

说：“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又说：“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由此可见，学校的任务，最首要的还是政治任务。毛主席说，文化革命以前的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主席对待卫生部，也有过批评。说卫生部，也应改名城老爷卫生部，那么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呢？我看它如果不改变的话，又要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教育部，按照周荣鑫之流所要求的所说的教育部，好象我们的教育部，就是为了搞四个现代化的，是个传授知识部。是这样吗？四个现代化我们是要搞的，而且还要用大寨的精神，用总路线的精神去搞。但是，我们要搞的现代化，应当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首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这个条件下的四个现代化。如果象美国和日本，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四个现代化。那样的国家，我们不仅不搞，而且呢，我们无产阶级还要用革命用流血牺牲去打碎那个丑恶的四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由党的基本路线所决定的我们的教育战线，我国的教育战线和咱们的国家是一样的。现在呢？基本矛盾仍然是教育这个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个矛盾。这个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呢？不是教育质量高低的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的危险不是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仍然是修正主义。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鱼目混珠地说，你能把三脱离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最大祸害，他们所说的三脱离，其实所指的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那个脱离，把他说成是修正

主义的最大祸害。我看别有用心。举个例子么，在一九七四年，我去接待过一位非常傲慢的澳大利亚的教育家。当我们谈到我们正在向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努力地进行改革。他马上就同意我的观点。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也赞成。”他说论理论联系实际，你们中国不如我们澳大利亚。我们澳大利亚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一般地来讲，都是那些牧场主的儿子。他学习啊，在学校，他实践就回到家里来，他的家，实践机会特别多，特别好，条件比你们还好。这就是说，理论脱离实际这个问题，它有阶级性，谁都可以用。不能抽掉阶级内容。这样讲，只能是取消和回避资产阶级专政这个实质性的问题，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所以，我们同志呢？不能在暂时地斗争胜利当中，忘乎所以。咱们教育阵地，不能说一个学校领导班子解决了，学校就由无产阶级完全占领了。也不能说从一九六六年以后，学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了。不能这么看。学校还有那么多问题没有解决。思想路线解决了没有？教育路线清没清？方向明没明？培养目标是不是已经大家都确认了？不是那个情况。教师队伍的世界观改造刚刚开始嘛，教学领域里面斗批改仅仅是刚刚开始，远远没有完成。尤其是在学科领域里面，资产阶级的偏见特别特别顽固，所以说教育革命仅仅是刚开始，刚开头，不是过头。咱们教育革命最后胜利还需要咱们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躺在仅仅一点成绩堆里睡大觉，局面刚刚打开。在目前，我们应当对我国的教育形势，有一个明白的估计。应当承认我们有不少问题，不

承认问题，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好经验没有总结，实习和推广，还有教育方面一些理论性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搞明白，办学方向还没有继续端正，培养目标还应当进一步的明确，学校的组织建设、班子建设还总不能令人非常满意，教师队伍的改造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学生的思想转变工作还有那么多的问题，招生制度仅仅刚刚进行改革，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完善，毕业时的分配政策仍然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考试制度咱们正在摸索，学制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新的无产阶级办学计划还没有成型，实现宏伟的规划，这就是设计科技网刚刚开始，开门办学方面，我们抓得还不够好，课程设置至今还有争议，三结合的教师队伍建设和三结合的教学体制有些单位还仅仅是纸上谈兵，教法和教材还要进一步深入，进一步地改革，需要搞的是革命大批判，澄清咱们思想路线，开辟正确道路，深入教育革命，深入到学科领域。现在我们还谈不上用阶级斗争的精神统帅我们教学大纲，我们也没有完成用教育要革命的精神去改造我们的办学计划。也就是说，学校阵地无产阶级远远没有彻底占领，完全改造。不是有的人叫我们承认错误么，那么我们也只能这样的承认，在前一段的教育革命当中，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抓得还不够紧，对旧的教育制度仇恨还不够深，改革的还不彻底。如果这也满好，那也完善，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搞教育革命了吧，还有的人等待着和我们搞秋后算账，我们就用你们等，现在我们就要算，账总是要算

的么，一九五八年镇压了我国的第一次教育革命，就是周荣鑫和他的主子们和他反动的一帮，他们干的。这个账要算，十七年的账都要算，七二年那个账也要算，一九七五年这个账更要算，新账老账总算，都要清算，谁也跑不了谁，对于呀，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我们需要的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是呀，同志们确实有那种盲目乐观，问题可多了，这次路线斗争仅仅是我们教育战线的事吗？光光是科技战线上的事吗？都不是。教育战线、科技战线仅仅是在修正主义复辟的黑土壤里面首先冒尖的，首先发芽的两棵草。教育战线的这场斗争，仅仅是医学战线上的反击的暂时胜利。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是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仅仅是整个阶级斗争这出长戏当中的刚刚拉开的一个小镜头、小序幕，斗争路子还长着呢！更艰难的斗争还在后头，引鸡一上房、狗急跳墙，不要以为党中央、毛主席给他们开了会，给他们打了招呼，他们就服气了，就彻底解决问题了，他们又不是天真无知的穿开裆裤的小孩，给他们打招呼，他们会跳起来的，骂起来的，会骂娘的、骂街的，甚至还有可能破釜沉舟。不是有的人讲么，不要怕做被打倒的人，还鼓励他们的爪牙们，同志们应当清楚，清华大学有两封黑信，写黑信的是走资派和三个投降派。但是也应该看到，没有写黑信的走资派投降派也大有人在，直接插手刘冰等人写黑信的大有人在，没有直接插手的也大有人在，为反党黑信擂鼓助威撑腰的人，至今还在那里猪鼻子插大葱装象。胖猪长得再大也成

不了象。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他们说是整人运动，革命造反派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他们全说成是革命群众抓他们小辫子，现在还那么讲，毛主席亲自发动一场批林批孔，他们至今还屁股坐在林彪那一边大骂秦始皇，为反动的儒生们鸣冤叫屈，不是一般问题。是认识问题吗？决不是，思想路线问题，执行工作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斗争。什么叫走资派，大家都知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在哪里呢？就是那帮狐群狗党，搞右倾翻案的反动的一帮，就是那些对文化大革命对新生事物恨之入骨，耿耿于怀的那些复辟狂，就是那些文化大革命以后重新上台的克己复礼的得志便猖狂的走资派、翻案派。得志便猖狂这些人，上台以后不到一年就反攻倒算，连象都不装，太露骨了，仅仅是一年时间嘛，甚至于不到一年，咱们就看他那股猖狂劲，看他那股迫不及待的劲，说他是走资派我看都不够劲，够上跑资派了，多么猖狂！我们看毛主席发表的最新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这条指示的发表就是对那些走资派们，妄图借助安定团结的口号搞阴谋诡计的有力回击。主席的最新指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条指示的发表，这是彻底的宣布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口号的彻底破产。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引起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但是啊我们又不能对主席反复强调的过去那些精辟论述一点也不能忽视。主席在新年元旦的时候两首诗词的发表，给全体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它激励全体人民要以只

争朝夕的精神，愚公移山的志气，大寨人的干劲，建设共产主义，攀登新高峰。然而，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毛主席在谱写两首诗词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子？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即将不得不爆发，国内的反动阶级，资产阶级分子向党发起猖狂进攻，阴谋实行反革命政变。今天主席诗词的发表，确实是对我们党内那些埋头经济建设，埋头粮食，埋头智育这些忽视党的基本路线的人们，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形势大好，确实很好，越来越好，形势逼人，真是逼人，不仅逼得我们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用大寨人的精神去干社会主义，去变大寨，去搞四个现代化，而且又有的人逼得我们再上井冈山，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要干什么，大家都清楚，不过呢，有的人也确实经常产生一些糊涂观念，咱们这个党，不是个经济党，不是个智育党，不是个粮食党。我们这个党是抓阶级斗争的，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是抓人的意识形态的，是搞上层建筑的，如果我们只是埋头生产，只是在自己那个职权范围内，那个小范围内抓一点基本路线远远不够，不要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世界上世界观就那么两家，路线斗争也从来不是这两个小单位里面孤立进行的，他都是与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紧密相关的，而且要受到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支配所影响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都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所以我们不光不能单单局限于满足于抓好本单位的这点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要关心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尤

其是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下级服从上级，这是个原则，确实是原则，但是对于反动的思潮，反动势力一点也不妥协不让步，坚持正确路线，更是原则。党的领导都是靠人来实现的，人都是有思维的，都是有程度不同的需要改造的，世界观，尤其是一些老同志们还存在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对文化革命的态度问题，解决没解决？所以，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

文化革命以前那些走资派们，他们也就是喊这个口号嘛，党的领导，其实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实际上就是要名正言顺地反党，反对党的领导，搞复辟，推行反动路线。在这次右倾翻案风当中，英雄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他们坚持了正确路线。他们迟群同志、谢静宜同志体现了党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周荣鑫等等奇谈怪论，统统是放屁。清华、北大迟群同志、谢静宜同志一点也没有执行，顶得好。咱们辽宁省尽管有的人拿着周部长的讲话，到省委去闹事，为什么不传达周部长的讲话，就不传达。尽管这样，有的人也顶住了，一个字也不传达，顶得也好。这就是党的领导，这就是党的原则。周部长讲，他说北京市文教组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说什么只听毛主席的，剩下的谁也不听，听了以后真高兴，真长志气。如果咱们所有的国家机关，所有的文教组，所有的大专院校都这样，那该多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地贯彻执行，主席的思想在全国人民的心目当中扎下了根，而且根深树大。这样的话，单凭几个小丑，几个反动儒生，破坏捣乱，造谣污蔑，

无成大事，翻不了船，掀不起大浪。也就是说，这个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战无不胜。很遗憾，在我们科技领导机关里面，至今还存在着一种人，这种人他以为也是老中青三结合，结合进去的，但是呢？没有坚持正确路线，成为老中青三结合班子当中的唯命是从的小绵羊。这样的年青干部，只得批评，没有什么代表性，对不起文化革命，对不起革命群众，更对不起主席。这次右倾翻案妖风，全国有理想，搞的有不理想的，好多地方，好多省市还是死角，死气沉沉，死水一潭。周荣鑫他们搞右倾翻案的时候，有好多的省，真动起来了，挺积极的，组织传达，慎重其事，重新研究教学计划，各条战线都有反响，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积极呢？右倾翻案风的反击，这场战斗开始了，按兵不动，没有反响，真可恨。搞回潮倒是挺积极，搞反击就是不积极，什么问题？路线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思想路线问题，对文化革命的态度问题，不是我在这里给人家戴大帽子，还搞什么阶级斗争，还抓什么基本路线，多么严重的一场政治斗争，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些问题不要埋怨我口气大，就是讲话放大炮，听说咱们山西最喜欢放大炮的人吗，有那么一些地方，在文化大革命当时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这样一些老干部，上台以后，对群众组织的代表，对造反派的优秀分子优秀代表，冷眼相待。他们利用安定团结这个口号，在革命派，在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当中，在新干部队伍当中，大抓派性，抓派性头子，给这些青年干部，造反派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有的省

份，有的地方，甚至于在机关里面，把那些群众代表，造反派的老代表，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架空，排斥，坐在屁股底下，用泻肚子的办法，把他们泻走了。把他们分配到基层去了，甚至于不分配工作了。有的人还给他们办学习班，承认错误，写检讨，就是打击和排挤革命的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多么严重的右倾翻案。组织上的右倾翻案，最可怕、最关键，不是有个大人物那么讲吗，当有的人向他汇报工作，汇报三结合的班子，他就说：不要给我提什么三结合，提什么老中青，我不愿意听，我不明白，你就提一二把手行了。这种在组织路线上的右倾翻案，从全国看来比较普遍，有的甚至达到非常猖狂的地步，有些省份，省市，县社，就是现在还是继续存在和发展，所以，从全国的范围，这种问题的存在，这种倾向的存在，就自然地、本能地在我国形成了一股右倾势力，强大的右倾势力。困难确实很大，斗争不是那么容易的，据我自己的理解，倒不一定对。现在分析我国的政治状况，斗争状况，从组织上看，从精神上看，从意志上看，从路线上看，用那法权的观点去看，无产阶级的力量，革命的势力占统治地位，东风继续压倒西风，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某些领域里面，某条战线上，某些角落里面，反动势力，资产阶级的右倾保守势力，在那里面蠢蠢欲动，趋向于上场。资产阶级的土围子，也在那里偷偷地增多，默默地加大。据我看，七八九月份，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是其中的一个土围子。也正是那个土围子，被张春桥同志

批得体无完肤，骂得心惊胆颤。经过一场斗争之后，叫我们重新打开张春桥同志的文章，去重新的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理解阶级斗争的性质，尤其深刻。毛主席一再强调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又强调说，要彻底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因为堡垒一样，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嘛。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了。一九七五年，就是这继续嘛，性质、任务、对象都没有变。我看哪，主席的这几条指示，就是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搞革命所制定的主要对象，也是我们国家出现修正主义的主要危险，是我们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条，忘记了主要对象、主要矛盾。我们天天都在那里面喊阶级斗争啊，基本路线啊，我看哪也只能是空中的口号，时髦的空话，所以要求我们必须端正学风，从理论上必须搞明白，要理论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能光光住在里边、住在小屋子里边，搞自我革命。有的同志倒读了这么多书，那么多书，在路线斗争面前，你就用呀，他也不用，对不上号，好象是给人家学的，我看学的再多，等于无用，都就饭吃了。光搞自我革命，光改造主观世界，不搞路线斗争，不搞注重改造客观世界，不能把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世界辩证地看，统一起来，这样的人我看只能是闭门读书，闭门修养，这些那也能算得上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者，不是一个清醒的革命者。

你要说他是一个口头革命派，他还真委屈。学风必须得端正，不端正学风，也只能说你一个口头革命派。咱们省在十月份和十一月份，各个大专院校涌现出了一批自动地站出来，在没有什么中央文件这个指示精神以前，就对这个奇谈怪论进行批判的这样一些反潮流的闯将，在省委里面，主持开了一个会，教育革命的座谈会，一共十一名，在那个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讲，我说如果咱们全国的革命青年，全国的工农兵学员，都能够象咱们在位同志那样的，都有这样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都有咱们这样的路线觉悟，有咱们这样的革命精神，如果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咱们全国青年都这样，主席该有多放心，恐怕主席就能够睡上好觉，能够健康长寿。如果咱们所有的青年，所有的革命同志，所有的革命干部，都在那里边擦亮眼睛，睁大着眼睛，无时不刻地观察着修正主义形形色色的表演，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都在那里边呢，警惕观察，看谁敢翻案，看谁敢反攻倒算。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这个国家大有希望，党就后继有人啦。咱们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论它的性质来讲，目的、意义、任务，我看和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基本是一样的。上、管、改大学，就是在学校里边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全面专政的一个大的事迹。是特殊使命。这个大学是我们无产阶级办的，是面向工农兵开门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大学的当然的主人。当小绵羊的人不识时务、不识抬举，糊涂，至少是个糊涂

虫，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工农兵学员应当在大学里边，应当是这样的，上大学扬眉吐气，管大学，理直气壮，改造大学，理所当然。应当这样。可是有些同志往往不是这样。脑子里边那么多的糊涂观念。智育第一，学而优则仕，一些旧的传统观念不少不少，他们一点也不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争气，有的人还拜倒在学术权威的脚下，恭恭敬敬，唯命是从，没有一点骨气，连半点阶级自尊心都没有。如果这个学校不需要象我们这样的人来上管改，而且就是单纯的传授知识，那么这个大学还要我们这些人来占领干什么。斗争的规律再一次告诉我们，形势越是大好，我们越是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越是国民经济蓬勃发展，越是要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越是安定团结，越是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出现，越是老一代的革命家，越来越少，老一代的革命家，年迈体弱，我们越是要搞好三结合的班子建设，越是要捍卫文化革命的成果，越是要培养接班人，越是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党的基本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它没有什么阶段性。有的人觉得基本路线有的时候好象是有阶段性了，不用了，该抓一阵生产了。糊涂观念。党的基本路线，是贯穿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有些人总喜欢制定这一个纲，那个纲，纲就多了。不管什么纲，都从属于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的都是目，有些人物把三项指示为纲捧起来了，贩卖出来了，大有文章可做，我看哪他是走资派们提出的一个折衷主义的口号，在实践上行不通，理论上是反动的，搞的不是

基本路线，搞的不是唯物主义，搞的是唯心主义，是二元论，是多中心论，多纲论，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大家应该搞明白。这个反动纲领的制定，它的由来，我们看哪也应该搞清楚。党的基本路线，决定着我们的教育路线，决定着我们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它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生命线，也是我国教育革命的生命线，只有我们年年讲，天天讲，我们就将战无不胜。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变修正主义，必须时刻牢记的党的基本路线，高度的警惕修正主义这个主要危险，把革命引向更加深入。

同志们，大家应当高兴的看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正以着大破大立，厚今薄古的革命精神，一反潮流几千年，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正在摧毁，一整套崭新的无产阶级自己的教育制度、教法和教材正在通过实践逐步的建立和巩固起来，中国人就是要走教育自己发展的道路，就是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无限风光在险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教育革命胜利万岁！

沈毅：领导让我说一下，这个，铁生同志反潮流事迹很多，这个，这个用几十分钟是讲不完的，他，这个，铁生同志是我们辽宁省锦州市兴镇县的，他原先住在兴镇县，他家，他父亲是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林科务研究所的一个老工人。铁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造反派，和全校师生一道造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六八

年带头下乡，到农村去，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与工人农民相结合。他下乡不久，铁生的母亲也响应主席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这个铁生所在生产队是兴镇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这个大队阶级斗争是比较复杂的。多年来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生产搞的一踏糊涂。铁生到了这个生产队以后，担任第四队队长，在担任队长过程中，带领革命群众，搞大批大干。方才就讲了，他担任生产队长的时候，生产队是一无柴草，二没口粮，三无资金，还有那么多的外债。他就领导贫下中农，战胜了这些困难，并且在斗争当中，狠反了那些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动。七三年考大学的时候，铁生就被贫下中农选送考大学。铁生在以前也有的同志提出要他考大学，他不去。他这一次为什么要去考大学。方才就讲了，是因为他的生产队，他是队长，他的队又新买来了两匹骡子，这两头骡子很不幸，很快就得了病，他因给这两头骡子治病，奔跑了几个月，由于，当地个别兽医不能为贫下中农服务，所以，就未能很好的治疗，结果这两个骡子，一个死了，一个是虽然活了，留下后遗症，不能使役，对于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在他脑子里深深打下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兽医，如果没有自己的兽医，贫下中农就要遭瘟，就要遭罪。另外一个，因为他这个地区是一个山区，年年干旱，在他领导下治了一些坡地，但是没有根治，特别感到需要在生产斗争当中科学种田，需要解决水的问题，所以，他也想能够学点治水，治水这个方面的一个知识。

将来回来农村，回到自己家，把农村改变了。贫下中农选送他以后，当时我们辽宁省，七三年招生，从省委这个角度，坚决贯彻主席七·二一的指示，但是，怎么个贯彻，招收那些学生，在这个问题有争论。各个市、地，在省委会议提出各种意见，但是省委希望各市摸索一下，怎么能够把学校招生工作搞好。当时锦州市委在铁生他们这个县搞过试点，在这个县搞试点，整个考生百十来人，都是贫下中农选送的。有一些按照规定是这么多，但是考试的时候，就增加了不少。为什么增加呢？就是有些同志不能按照政策办了，结果走了后门。铁生当时是生产队长，生产很忙。事先因为他今年报考啦，县里，社里就准备给他一段时间，让他复习功课。铁生同志对工作非常负责，坚决不干，所以，整天领导贫下中农铲地，补苗，大搞生产运动。他大致上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二十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将近，确实是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有时间去复习功课。他不仅劳动这些，而且晚间回来处理生产队的工作，所以一天劳动，工作对他来说这个担子是很重的，原定计划准备是要再复习一段，但是由于当时锦州市考虑还是要提前考一考，所以，就在七月份，就把这一些同学招集在一起考试，铁生同志接到通知，第二天赶到县里考试，因为，第二天报到，所以，他接到通知第二天仍然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其它考生上午已经都报到了，所以公社带队的很着急，就缺张铁生。张铁生什么时候才到的。晚上五点以后才到县城，到县城以后其它同志都知道了要考试，好了，

第二天就要考试都准备好了，张铁生一听要考试，也感到是很不对头，考试也考不出真正的知识，这么考试有什么好处呢？在他思想就有一个印象。第二天到考场，上午考试。他进考场一看啊，原来规定的名额已大大超过。另外，是特别是有一些个他也认识的，同样下乡的，结果在农村由于受智育第一毒害的个别青年，几年来没有很好参加劳动，这一次考试，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再加上课堂的监考人非常严厉，规章制度法规，他对这个事情很不满意。上午勉强的答了卷。中午吃饭时候他因为当时是个生产队长，一般知识青年。所以他也没有注意这钟点。回去到街上吃顿饭，完了就比较疲乏，因为也经常劳动，就躺到考场另外一端一棵大树底下有点困，睡觉了，结果这边两点已经到了，他醒了，一问过路什么时候，两点多了，他就糟了，考试已经过去。它紧忙跑到考场，到了考场门已经关上，门关上了，敲门，里边答应说干什么的，说考试哩。说考试不行啦，晚啦！铁生说我是贫下中农送我，要我考试。谁送来也不行，这是制度。铁生说你这制度我也制度。你不能去掉我的考试资格。里边说就得取消你，因为你现在已经违犯了考试制度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看门是推不开了。他走到一个窗户一看窗户没关严，推开窗户跳了下去。跳进去了。因为监考有的是他原先念书的老师，说铁生，怎么来这么晚呢！你坐在那儿快答吧！铁生进去了光顾生气他也不答卷，那个老师说，这题不很简单吗，你答吧！还不弄个几十分，最后也可能取上。铁生说我不答，我要找你

们领导提意见。这个监考的说：你这个傻孩子，你上那儿找领导去？你能看着领导嘛！他说我要提意见。他说你先答卷吧！答完了再说。铁生心思了心思不答，完了就把卷反过来写了一份答卷。把这封信写了就交了，他是第一个交的。当他站起来往讲台送卷的时候，有几个监考的同志，有一个老同志说：哎呀，怎么跳窗户的那个家伙答得挺快的。

另外一个女老师把卷拿起来一看，噢，有一个男老师把卷拿起来一看，啊，这是白卷，没有写字，就议论，他没答，怨不得他这么快能答上卷。一个女老师把卷拿起来，哎，这后面有字。当时眼看考试就要结束啦！就喧腾起来了，就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妈张铁生这小子真他妈混账，就要把我们这一次考试坑啦，上大学的希望也可完啦。有的说，这小子真瞎蛋，他赌一股气完了，和其他几个同公社几个青年一堆回到家啦，到家贫下中农问他，怎么样铁生今天考试？铁生说不错。但他心里知道，这个答卷有可能被领导重视，要掀起一场斗争，也有可能自己大难临头，因为自己越了轨。在这种情况下在家里劳动，仍然领导贫下中农劳动。当时他这个答卷就反映到省里了。我们省委非常重视。当时远新同志和其他同志看了答卷以后，认为这个学生很有见识，这份答卷很有份量。当时锦州市呢，负责同志很有压力，省委说你们不要有压力，你们做了好事。因为你们不这样做也不能有张铁生。所以当时，省委责成团省委、教育局负责同志到张铁生所在生产队了解一下张铁生的情

况，因为省委不了解，省委几个负责同志，教育局、团省委、青年办的几个同志，加上锦州市的几个同志到张铁生所在生产队，去那天因为交通不方便，县里派了几个车，派了几个军代表一起去，张铁生在生产队领着贫下中农在山上铲地。这一看来这么多小车，而且还有当兵的，所以群众议论纷纷，说，这回张铁生可闹出事了。就找铁生，这大队通讯员就跑到地里去找张铁生。张队长，张队长，这回有这么多人来找你来了。当时生产队议论纷纷，这回铁生，有的老贫农说，哎呀，铁生，是不是出事了，要出事了咱们怎么怎么的，这是讲了些鼓励话，也有的，因为他一直反潮流，对那些歪风邪气就敢斗，那些落后思想的人，心思这回张铁生该教训教训他了，过去他老是这么批了那么斗了，这会儿领导同志省里市里同志到那和他一谈，问他为什么写这个答卷，问前后思想发展过程，同时说你对这些课程到底怎么办？怎么认识。他谈了一下自己看法，这个当时因为这个东西，有的说，他根本就不明白，从文字来说数学、化学、物理他根本就不一定很好地改造锻炼自己，当然对上大学为什么上大学，他讲得清楚，就是为了回农村，决不是为了往上爬，决不是离开农村，仍然要继续吃高粱饭米，挣工分。所以说你要学什么？他说我要上医学院学兽医，因为他不明白兽医是农学院是医学院，说上医学院上兽医，最后省里领导讲了你学兽医省委批准你，但你别骂人，医学院不学兽医。这个这就是张铁生同志在写第一份答卷的当时的过程。我的也是感性知识，也

是以后到那个家乡，到县里到市里到省里领导同志的接触过程中，因为懂，作文、政治他也不明白。所以领导同志说，既然这样的话，有人这样提出问题，你是不是能在给你点时间你再把原卷答一答。铁生说行，你给我五分钟准备，结果他心平气和地他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给领导同志汇报，他就把这些卷重新又答了，答得基本上是满分，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满分，所以铁生这个答卷不是为了考试答的，不是为了考试写这些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而是为了汇报，这一切情况铁生同志受到了很大鼓舞，所以一再表示自己在这次革命当中，当时我们这个学校，正好张铁生所在的这个县兴镇县没有招收兽医专业，这个，同时因为这个我们学校负责这个地区，所以当时情况还不够那么了解，至于他以前反潮流的事迹就很多了，以后，我们也去了几次，贫下中农对张铁生同志有很大的评价，这些事张铁生同志上大学前后报纸已经介绍一些过了。其上大学以后仍然继续革命，在七四年七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张铁生上大学，七五年十二月份，和七六年一月份报纸和电台相继地发表了他的一些事迹，在这里就不准备多讲了多说了，我们这次来呀，主要到山西和大寨来学习咱们省里和大寨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回去以后呢，在教育革命，在学大寨运动当中，能够大大向前迈进一步，我们来了以后，受到省委领导和市委领导和各级领导同志这样地关心这样地照顾，我们表示非常地感谢。